



经典作家之萧三

1938年,萧三多次到共产国际中国部去要求回国,未准。10月又去要求,见到中共驻国际代表任弼时,他是长征后身体极度虚弱,暂时来苏联疗养的。弼时同志非常支持他的要求,说“回去很好”。当即让萧三填了一张简单的表格,写了一份详细的自传。11月弼时同志通知萧三,共产国际书记处已同意他回国。

3月5日深夜,萧三从莫斯科和刚刚到瑞典的爱妻最后一次通过电话告别。6日,萧三整装待发,随即踏上归途。萧三乘坐的车队,穿过冰天雪地,跨过沙漠软滩,终于来到中国的土地,到达乌鲁木齐。在市郊外,萧三看见迎面远远地开来一部轿车,道路狭窄,双方车子都停了下来,这时,对面车子里下来一个人,这是在莫斯科的老朋友邓发。原来,这是为了避开盛世才的侦探和国民党特务的耳目,才安排在郊区迎接的。

萧三随即和专程护送的苏联军人握别,跟邓发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报到。陈潭秋和毛泽民均来看望萧三。当时,邓发化名方林,是第十八集团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主管党在新疆的全部工作。萧三与邓发飞赴延安途中,在兰州停留了11天。一天,在兰州街头广场的

世界著名诗人萧三上个世纪80年代初离开了我们。三十几年来,淡漠了、疏远了,这个名字早早地远去了……“有谁知道他?”事实上,有价值的人与事是不会被人们遗忘的。没有忘记萧三的人,包括国外的学者、研究机构等也有很多。“有谁知道他”不依谁的主观愿望而转移,历史自然会有它自己的答案。

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著名汉学研究员索罗金将一本“苏联几代研究工作者都认真读过”的小册子寄给了我,那是萧三的论文《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中国文学艺术》,后来拙译发表在拙著《萧三佚事逸品》中。俄国人没有忘记他。

萧三去世20多年后的上世纪末,还有一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在中国台湾讲学,讲的竟然有“萧三对于中俄文化交流、对于介绍中国文化贡献”的内容!而院士本人的专业却是研究中国民间艺术及神话的。这位俄罗斯乃至世界均“屈指可数”的汉学家,就是鲍里斯·李福清!可见俄罗斯学术界对萧三的重视程度!

记得那时候李福清和田汉的儿子田大畏有一个合作项目,他们经常通信,有一次田大畏找我,说:“李福清在台湾讲学中遇到萧三俄文诗和俄文短篇小说,不知道它们的中文名字该是什么,他让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来找你。”田的俄语极好,比我好,只是他不熟悉萧三的作品罢了,可对我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加之我欠李福清的情太多,自然乐于效劳。李福清搞学术非常严谨,所以才要反复核实。在俄国,知道萧三的人非常多,我在以往写的文章里曾写到自己多次在苏联、东欧的一些国家里遇到知道中国诗人埃弥·萧(萧三)的人和故事。

就这样,田大畏求助于我约有七八次的样子,后来我干脆送给田一本我编的《萧三诗选》,看来还有点作用,田大畏找我的次数少多了。又一次田拿来李福清给他的“埃弥·萧短篇小说俄文目录”让我写出它们的中文,好像其中有一篇我也没有查清楚。我当时就纳闷:李福清在台湾有关萧三的课题怎么讲得那么多那么细呢?我们惭愧啊!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在我离开莫斯科大学回国之前,苏联作协给我安排的“陪同”(接待我的任务已结束了近一年)佳丽娅跑来交给我一样东西,说:“这是苏联作协送给你的礼物!”打开一看,震惊:原来是他们特地为我精心复制的一套胶卷,非常清晰,有好几米长,是萧三自1931年后在俄国发表的诗作封面、目录以及诗人的俄文

群众集会上,萧三与邓发看见台上一人领头呼口号“蒋委员长万岁!”他俩扭头就走。忽然,邓发扯了一下萧三的衣袖说:“老萧,你仔细听!”萧三侧耳细听,才发现群众喊的是“反对苛捐杂税!”他俩肚子都笑痛了。

萧三乘坐大卡车行走在开往西安的途中,他构思了一首歌颂八路军,歌颂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诗,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欢迎华侨归国的晚会上,朗读了它。由于长期的国外生活,对国内许多新鲜事物感到陌生,竟将“八路军”称为“第八军”。后来,邓小平听了他的朗诵之后直率地说:“你的诗我没意见,只是‘第八军’应该改为‘八路军’。”萧三听了,歉意而欣喜地连连点头说:“好,叫‘八路军’好!”

李富春、王若飞、许之祯、萧劲光等前来欢迎萧三,并问:“还回那边去吗?”萧三急忙大声回答:“我现在回来了,我不走了!”

大家问长问短,格外亲热。萧三让把他的行李直接搬到“鲁艺”去。中组部部长李富春想了一下,立即同意了。

萧三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到‘鲁艺’工作,说也奇怪,几乎是自己分配……按规矩凡到延安的人,先要住组

有谁知道他

高陶

手迹,手迹潇洒倜傥、神采飞扬,没错,是真实!记得我拿到它后非常激动:一是他们太周到了。二是苏联人对文化、包括对异国文化、包括对一个在他们那里仅仅生活工作过十几年的诗人萧三,都是那样重视!后来我在拙著《萧三佚事逸品》中选用了其中好几张图片。照说也应该给人家资料费什么的,是吧!

这些资料我国没有,现在他们也通过萧里昂给了我国现代文学馆这样的一套胶卷。

李福清去世前些年,又带给我厚厚的一摞复印件,是萧三的俄文著作:《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评述)》,我以前似乎看到过它的极小部分俄文片段,至于全文,这还是第一次。太珍贵了。李福清神色庄重地说:“这是我特地去找的,不容易呢。我找到1934年《中国问题会刊》14期,这家杂志评价此文时说:‘对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做了使人颇感兴趣的阐述’,所以我就给你带来了。”

老李在自己工作极忙、身体又不好的情况下,为我做了那么多……是温暖是感激是促进是激励,说不清了!只记得当时我十分感动地说:“我一定把它翻译出来!”

诚然,现代人对这些文章毫无兴趣,但当他们知道这些文章“来路”的时候,即会顿生敬意,并一定会好好保存它。这些来自中国大陆,代表着不同出处、不同时间、不同观点的资料信息,是经过不同途径、不同国际的人们,千难万险寄到收件人手中的,有些是从德国、法国、中国香港、东南亚等地换了包装与寄信人后,再寄到苏联的,有的在中途丢失,有的要辗转数月……总之,要用俄文或中文写成一篇相对完整相对可靠的文章交给世人,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笔者孤陋寡闻,只知道迄今为止该文还没有其他中文译本,笔者只根据俄文译出,并未核实作者。现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发表如下,以示对历史、对前辈、对萧三、对俄国学者们的尊敬,同时也希望能对有关研究人员有一点点参考价值。

经典作家

萧三初到延安

沙 子

织部招待处几天,然后分配。我之所以要去‘鲁艺’,是因为在国外听说有这么个艺术文学院,而且写了文章介绍过它,我自己觉得,早就该是该院的人了。”

太阳落山了,萧三和邓小平、邓发一起向山上窑洞走去。忽然看见身材魁梧的毛泽东从窑洞里走出来,李富春走上前去,告诉主席都有哪些人来到,并说:“萧子璋现在的名字叫萧三。”

毛泽东说:“那还是一样。”便快步前来迎接萧三,对他亲热地说:“呵!10多年不见了!”

萧三问主席:“身体好吗?”主席答:“好!好!”

然后,主席领萧三到陈云的窑洞里小坐。他从小袋里掏出红锡包香烟,请在座的邓小平、邓发、李富春、陈云和萧三抽。

不一会儿,大家乘上主席的专车——延安惟一一部没有盖子的救护车,来到杨家岭。

主席请大家到自己的窑洞里作客。主席谈笑风生,不时地开玩笑。萧三讲了一些国外的见闻。主席笑道:“这是洋新闻。”

吃饭时萧三问有没有辣椒。主席说有,还说:“现在可以开个辣椒同乡会。”又说:“凡是革命的都吃辣椒,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吃辣椒。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当然也吃辣椒。可见吃辣椒的都革命。”大家都笑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回忆起20年前他和萧三从北京去大沽口看海之行,席间又是一片欢笑声。主席说:“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的……我8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

晚饭后,主席特邀萧三一人单独到他简朴的书房兼卧室去谈天。

这一天,萧三在日记里写到:“走出窑洞,天上星星高照。我和主席作别时,他对我说:‘你来,下午来!’(主席通夜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上午才睡觉)我们握了手,他又两手并放膝前,一鞠躬(还是青年学生时代的样子)。我也向他一鞠躬。主席叫我乘他专用的汽车到城北门外的山下,由警卫员提马灯和我很重的皮包,一直送到山上

沙可夫(‘鲁艺’副院长)的窑洞里才转身回去。这个下午和晚上,我实在太幸福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第一个延安之夜他失眠了。白天的印象太太好了。加之思念叶华母子,担心他们的生活、健康,抱憾他们不能分享今日之快乐……

萧三在延河东岸王家坪的一座山下安了家。这一带是果林,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到处弥漫着花香,沁人心脾。萧三住在新盖的平房里。屋里有一张木板床。在兰州发给他的那条蓝布棉被,一半铺,一半盖。书当枕头,睡得照样香甜。

萧三自回到延安的那一天起,便受到新老战友热情的接待和欢迎。王若飞、李富春还分别设宴为他接风。

5月5日,毛泽东专程到“鲁艺”来看望萧三,边走边笑说:“特来拜谒。”萧三忙说:“真不敢当!”

萧三的窑洞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毛主席便坐在木床上,背靠着墙谈了起来。他们谈到文学问题,谈到《聊斋志异》时,主席说: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他们知道的鬼、狐故事,然后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狐狸精来呢?”

又说:“《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后来,主席问起萧三在国外的情况。萧三说:“我在国外写过几首诗,人们就称之为‘诗人’,其实很惭愧。”主席肯定说:“当然是‘诗人’。”萧三说:“我写东西很迟滞,不能‘下笔千言’。”

主席说:“‘下笔千言’的,有时‘离题万里’。”萧三告诉主席:他在苏联写毛泽东

的传记,想再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请他详细谈谈。

主席说:“无事时‘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可以在政治上帮助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作引线,那是有味的。不过斯诺花了我四个晚上,以后我再也愿意谈自己的什么了……”最后主席说道:“等我休息的时候再同你谈。”

晚8点左右,毛泽东邀请萧三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和“马列学院”成立周年晚会。

毛主席一走进会场,大家都鼓起掌来。他挥手答礼后,坐在第二排长凳上。台子是土垒的,尘土很厚。节目开始前,大家相互拉歌子。不分官兵,想让谁唱就“拉”谁。萧三初到延安,哪里懂得这个“规矩”?没料到大家会“拉”他唱歌,推辞不过,只好站在板凳上唱了一支法国歌曲《Carmagnel-e》。

会场上又掀起一阵热浪。人们高喊要毛主席唱歌或者讲话。主席不愧为“老将”,始终“镇定自若”,岿然不动。大家无奈,只好作罢。

5月20日傍晚,萧三如约去看望毛主席。主席正在读《宋史演义》。说他这次用了40元在西安买了一二百种旧历史小说。又问萧三说:

“你如果要买什么书,开个条子来,我替你去买。”

主席还告诉萧三,昨天中央开了会,决定让萧三在“鲁艺”编辑部工作,选出一些好的作品发表……谈到诗,萧三把自己手抄诗本给主席看。主席略看了几首,比较喜欢旧体诗。说:

“《梅花》那首写得好。”

谈话间,主席又说了不少笑话,又说:

“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

谈到萧三与其兄萧子升(后改为萧瑜)决裂的问题,主席感慨地说:“看来,你们兄弟关系,有点像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

萧三说:“那我可不敢媲美。”主席说:“是说在兄弟关系这一点上。”谈了大约三个小时,萧三起身告

辞。主席留下萧三的诗本子,说还要慢慢再看看,接着送给萧三两听香烟,便一起走了出来。

萧三还是搭主席那辆“老爷车”回自己住处去。

车行到“鲁艺”山下,发生了故障。司机在修车,他们便走下车来。

他们漫步在路上,边走边谈。萧三告诉主席,他在莫斯科临回国前,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要他转达向主席的问候,并谈起“何胡子”(何叔衡)、蔡和森、瞿秋白三同志的牺牲,唤起了主席对战友们深远的怀念。他一会儿仰望皎洁的明月,一会儿看着两岸的灯火,久久不语。

沉默了一会儿,主席说:“是啊,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延安的文化运动多好啊!”

一个月后,萧三收到毛主席寄还的手抄诗本,还附了一封信:

子璋同志:

(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

(三)马,待查问一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果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边外,就得另想办法了。

敬复。

毛泽东6月17日月中,苏联著名的青年制片人保罗·卡尔门乘坐小汽车,在尘土飞扬中从迢迢千里之外的重庆来到延安。组织部大礼堂里人声鼎沸。萧三坐在长条凳上,正准备看戏的时候,卡尔门走到萧三身旁。其实两人早已相知。在西班牙战火纷飞的大会上,萧三发了言。卡尔门忙于捕捉镜头,两人没有顾上结识。这次,两人初识,却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似的。

主席几次接见卡尔门,都是萧三当翻译。他把宾主之间的融洽的感情和幽默的语言,都生动地传达了出来。室内不时地爆发出欢快的笑声。卡尔门拍了毛主席工作时的电影。途中,还拍下了主席与农民、主席和几个小八路谈话的镜头,也拍下了主席、萧三和红小鬼亲切谈话时的合影。

卡尔门说,他要把他在中国、在延安的一切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通过影片告诉苏联人民,告诉共产国际书记处以及各国驻国际代表。当然,有机会更要带着照片去看望叶华母子,给他带去延安亲人的信息和问候……

卡尔门离开延安前夕,萧三兴奋异常,仰望宝塔山的巨大剪影,他又一次失眠了……

重讲解政治课中所需要的名词术语、基本概念(如苏维埃、第三国际等)。

在鄂豫皖苏区,除列宁小学以外,还创办了“列宁”和“马克思”中学,以及一些成人学校。从现有材料看,去年冬天识字的人数已增长了40%—50%。

许多从前一个字不识的人,如今已能写标语、做简短的有实际内容的发言。但是,同其他苏区一样,教员和教材仍感缺乏。有些地方,在没有其他好办法时,只得把《千字文》当做教材。也有的地区把私塾先生聘为新学校的教师。最终,由于财政的拮据,所办学校不能使苏区的所有学生都来就学。

浏阳县有五十余所列宁初级小学和一所高小,每所学校还为女孩子们开设了下午半日制学校和成人夜校。

……1933年夏,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上,登载了一组叙述人民教育的文章,其中说:……尽管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接连不断向苏区进攻,尽管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困难,但苏维埃仍在苏区内继续努力发展文化和教育。苏区预算中为人民教育拨出了相当可观的资金。湘鄂苏区有700余所列宁初级小学(每村2—3所)。此外还设立了三所女子职业学校、800余所工农夜校和30余所妇女夜校。建立了约300个新剧团。几乎每个街道、每个村落都有戏剧小组、俱乐部和列宁“红角”,此类文化活动得以蓬勃发展。

……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组织“中国人民的朋友”的机关刊物《今日中国》1934年1月号上登了一则消息:

在中国中央苏区,1933年9月底对14个县的统计和1933年10月底对10个县的统计,结果是共有:列宁初级小学2777所,列宁师范学校2535所,学生总数82642人,其中男生62661人、女生19981人,其中红军子弟3947人、贫民与商贩家的孩子1466人。

1933年9月底,上述14个县成人扫除文盲的情况是:夜校3298所,学员52292人,读书小组19812个,组员87916人,读书俱乐部712个,读书委员会2744个。1933年9月以前共有未曾

学过读写的文盲:成年人205833,儿童93677,青年21673。

上述情况表明,在文盲占居民总数95%的中国,苏维埃政权是能够使中国人民得到真正自由的惟一力量。

某些国民党的出版物也提供了有关文化建设的有趣资料。例如,有一个名为《汗—血》的法西斯主义杂志出了一期专刊《文化战线上的剿共》,其中列举了非常耐人寻味的材料。……

作者对比了中国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教育工作效果之差异,对苏区取得成效之秘密做了如下解释:

“……我们的机构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多年,成效甚微……然而共党的扫盲工作取得了确实成效,事实不容否认。其原因在于:在苏区内,一切文化工作概由文化部门集中处理,工作安排妥当,联系遍四方。各个部门齐心协力——此乃其成效之根源……”

《汗—血》杂志上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在引证蒋介石关于苏维埃区和自己管辖区教育状况时指出:

“文化战线剿共斗争的意义在于,需先防止共党数量增多,其次是消灭现有共党……我们不应以老眼光看待敌人。仅以军事力量剿共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共党非同一般,非以往之异党能比也。共党虽穷,但毕竟办起了许多学校。

上面谈及苏区文化教育计划之状况,再观我文化教育工作,真可谓羞惭得无地可容。”

这种绝妙的供状并非绝无仅有……让我们再看看《汗—血》杂志同一期另一篇文章,作者是这样说的:

“……我们不能不思虑中国教育之状况。一想到这个问题便令人泪下。在社会经济遭全面破产之际,教育的荒芜自然无可避免,但往往是这种荒芜并非经济原因所致,乃因无人过问之故。”

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教育工作一片破败的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处于极困难境况,但却加紧创建自己的文化,它的确无愧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给予的称号——有文化的、文明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